

“逆向选择”困局与“新农保”财政补贴激励机制设计

□ 赵建国 海 龙

内容提要: 在自愿选择档次缴费的原则下农民普遍选择最低缴费档次参保致使“新农保”制度遭受逆向选择问题的困扰。针对影响农民缴费档次选择的农民参保支付能力和财政补贴激励机制两个主要因素,本文从省域和不同收入组两个维度考察发现诱发逆向选择行为的关键因素并非农民参保支付能力。在构建项目投资收益模型的基础上,本文着重分析“一刀切”和“差异化”两类财政补贴激励机制对各缴费档次收益率的影响显示二者均产生了负向激励效应,表明现行财政补贴激励机制诱发并加剧了逆向选择问题。消解逆向选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短期内应设置合理的财政补贴激励机制,变定额补贴制为比率补贴制;中长期要持续实现农民增收,并适时采取“强制参保”的原则。

关键词: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逆向选择; 激励机制; 缴费档次; 财政补贴

一、引言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采用“普惠式养老金+自愿性个人账户”相结合的财务运行模式。在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条件下个人缴费成为新农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设定的参保缴费标准分为5个档次:100元/年/人、200元/年/人、300元/年/人、400元/年/人、500元/年/人,参保人可自主选择档次缴费。理论上讲,个人账户具有“多缴多得”的激励效果(李珍,2010),农民理应选择较高缴费档次参保。然而,从当前众多新农保试点调研结果看,多数农村居民往往倾向于选择最低档次缴费标准(100元/年/人)参保,如安徽省蒙城县参保农民中选择最低档次的比重高达94.07%(黄明静,2011),辽宁省彰武县试点有88%的参保居民选择了最低档次标准缴费(程昕等,2011)。绝大部分农村居民在缴费档次选择中“就低不就高”的参保行为酿成了严重的逆向选择

问题。农村居民普遍选择最低档次缴费标准,不仅会因养老金收入替代率低而难以有效保障农村居民的老年基本生活(林义,2009;李珍,2010;邓大松,2011),而且会阻滞新农保基金的积累,危及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运行。因而,如何应对逆向选择问题、引导农村居民积极选择较高档次缴费标准参保成为新农保制度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挑战之一。

逆向选择是保险业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Akerlof,1970)。目前克服逆向选择问题的主要途径是将自愿性养老保险转变为强制性养老保险,即强行要求参保对象按照保险制度规定的费率或额度参保。考虑到新农保试点工作刚推行不久,目前农村尚不具备实施强制性参保的条件。为激励农村居民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指导意见》规定“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的,可给予适当鼓励。”然而,即便地方政府采取“多缴多补”的激励机制,部分试点地区绝大多数农村居民仍选择最低档次缴费标准参保。如吉林和黑龙江^{*1}选

* 吉林和黑龙江两省的缴费补贴标准为:年缴费100元补贴30元,年缴费200元补贴35元,年缴费300元补贴40元,年缴费400元补贴45元,年缴费500元补贴50元

择最低缴费档次的样本比例高达 87.12%。可见逆向选择问题仍较为突出。逆向选择的诱发因素是什么?是农村居民尚不具备选择较高缴费档次

参保的支付能力还是现行新农保财政补贴激励机制设计存在问题?因而,探析并解答上述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参保费用”与农村居民的支付能力分析

通常来讲,对于自愿性养老保险来说参保对象是否参保或选择何种缴费标准参保主要受制于其经济收入状况和保险费用水平。凯恩斯消费理论认为收入是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显然,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越高,其参保支付能力越强,对于“新农保”而言参保费用和农民经济收入水平将对缴费档次选择产生直接的影响。因而,为全面考察农村居民选择不同缴费档次参保的支付能力,本文从省域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农村居民不同收入组两个维度展开研究。

(一) 省域农村居民支付能力分析

从省域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维度分析,表 1 显示 2012 年上海市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高居全国榜首,达到 17804 元,农村居民按照最低档次缴费标准(100 元/年/人)参保,参保费用占上海市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仅为 0.56%,按照最高档次缴费标准(500 元/年/人)参保,参保费用也

仅占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 2.81%。观察表 1 发现,诸如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天津等经济发达地区,最高档个人缴费标准占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的比重在 2.81%~4.74%,这表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参保支付能力比较强,他们具备选择较高档次缴费标准甚至更高档次缴费标准参保的支付能力。2012 年甘肃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最低,仅为 4507 元,最低档个人缴费标准(100 元/年/人)、中档个人缴费标准(300 元/年/人)、最高档个人缴费标准(500 元/年/人)占甘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2.22%、6.66%、11.09%,表明甘肃省农村地区居民选择高档缴费标准参保的经济负担相对较重。除甘肃省外,贵州、青海等经济欠发达省份的农村居民选择较高档缴费标准参保的支付能力比较弱,较为适宜选择中低档缴费标准参保。

表 1 新农保缴费档次占全国各省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012 年)的比重 (%)

省份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元)	最低档个人缴费标准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	中档个人缴费标准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	高档个人缴费标准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	省份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元)	最低档个人缴费标准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	中档个人缴费标准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	高档个人缴费标准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
北京	16476	0.61	1.82	3.03	湖北	7852	1.27	3.82	6.37
天津	14026	0.71	2.14	3.56	湖南	7440	1.34	4.03	6.72
河北	8081	1.24	3.71	6.19	广东	10543	0.95	2.85	4.74
山西	6357	1.57	4.72	7.87	广西	6008	1.66	4.99	8.32
内蒙古	7611	1.31	3.94	6.57	海南	7408	1.35	4.05	6.75
辽宁	9384	1.07	3.20	5.33	重庆	7383	1.35	4.06	6.77
吉林	8598	1.16	3.49	5.82	四川	7001	1.43	4.29	7.14
黑龙江	8604	1.16	3.49	5.81	贵州	4753	2.10	6.31	10.52
上海	17804	0.56	1.69	2.81	云南	5417	1.85	5.54	9.23
江苏	12202	0.82	2.46	4.10	西藏	5719	1.75	5.25	8.74
浙江	14522	0.69	2.07	3.44	陕西	5763	1.74	5.21	8.68
安徽	7160	1.40	4.19	6.98	甘肃	4507	2.22	6.66	11.09
福建	9967	1.00	3.01	5.02	青海	5364	1.86	5.59	9.32
江西	7829	1.28	3.83	6.39	宁夏	6180	1.62	4.85	8.09
山东	9447	1.06	3.18	5.29	新疆	6394	1.56	4.69	7.82
河南	7525	1.33	3.99	6.64	全国	7917	1.26	3.79	6.32

数据来源: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而成

从全国农村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看,2012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7917元,最低档个人缴费标准(100元/人/年)、中档个人缴费标准(300元/人/年)、最高档个人缴费标准(500元/人/年)占2012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26%、3.79%、6.32%。可见,农村居民即便选择最高档缴费标准参保,其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也低于城镇企业职工个人养老保险缴费8%的水平,这反映出我国农村居民整体上具备选择中高档缴费标准参保的支付能力。

由此可见,除甘肃、贵州、青海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选择高档缴费标准参保有一定经济压力外,我国经济较为发达、中等发达省份的农民选择中高档缴费标准参保的支付能力比较强。因而,从省域农村居民现有收入水平看,我国90%左右省份的农村居民具备选择中高档缴费标准参加新农保的支付能力。

(二) 不同收入组农村居民支付能力分析

依据收入的五等分分类,《中国统计年鉴(2012)》可以得到2011年各收入阶层的人均纯收入。2011年我国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高收入户、高收入户的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000.51元、4255.75元、6207.68元、8894元和16783.06元,高收入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几乎是低收入户的8.4倍,表明当前我国农户人均纯收入差距比较大,这直接导致不同收入组农户参保缴费的支付能力有着显著的差异,具体参见图1。对低收入户农村居民来说,如按照最低档个人缴费标准(100元/年/人)参保,参保费用占其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5%,按照最高档个人缴费标准(500

元/年/人)参保,参保费用占其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则高达24.99%。对中低收入农村居民家庭来说,最低档个人缴费标准(100元/年/人)、中档个人缴费标准(300元/年/人)、最高档个人缴费标准(500元/年/人)占其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35%、7.05%、11.75%;而对高收入户来说,3个档个人缴费标准所占比重依次为0.60%、1.79%、2.98%。因此,从农户不同收入组收入状况来看,除低收入农户选择中高档缴费标准参保的经济压力比较大外,其他收入组别的农户普遍具备选择中高档缴费标准参保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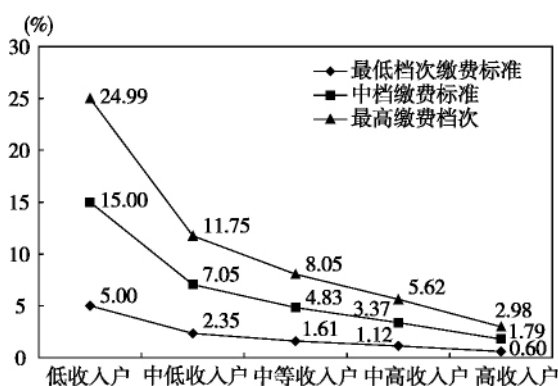


图1 2011年不同收入组农民养老缴费负担状况

由此可知,不论是从省域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分析还是从农村居民不同收入组的人均纯收入考察,我国农村居民普遍具备选择中高档次缴费标准参保的支付能力,部分农村居民选择最高档次缴费标准也“不差钱”,这充分表明农村居民参保支付能力并非诱发缴费档次“就低不就高”逆向选择行为的关键因素。

三、财政补贴激励机制设计与农民的理性选择

参保费用与农村居民支付能力的分析揭示了在新农保目前的缴费标准水平下,我国农村居民普遍具有支付中高档缴费标准的经济能力,然而,他们集中选择最低标准缴费档次参保的行为逻辑何在?基于此,下文着重研究新农保财政补贴机制设计对农民参保缴费档次选择行为的影响。

(一) 新农保财政补贴激励机制分析

目前新农保采取“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模式,其中政府财政补贴是新

农保区别于老农保的显著特征。政府对新农保实施财政补贴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基础养老金财政补贴,二是个人账户缴费财政补贴。政府财政资助具体形式和内容见表2。由表2可知中央财政补贴和地方财政补贴各自有着具体的分工。其中,中央财政负责补贴给付环节,即补出口,旨在保证养老待遇的普惠和公平;而地方政府主要负责补贴缴费环节,即补入口,旨在引导和激励农村居民积极参保。因而,地方政府个人账户财政补贴方式对农

民缴费档次选择具有最为直接的影响。具体而言,地方政府缴费环节财政补贴的激励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多缴多得,二是长缴多得。对于“多缴多得”的激励措施,《指导意见》中有“地方政府应当对参保人个人账户缴费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 30 元,对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的,可给予适当鼓励”的规定;对于“长缴多得”,《指导意见》中规定“要引导中青年农民积极参保,长期缴费,长缴多得”。然而,《指导意见》对“多缴多得”和“长缴多得”的激励措施并没有制定具体的办法。由于当前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当不均衡,加上新农保实行属地管理,地方政府制定的新农保财政补贴激励机制存在一定的差异。整体而言,新农保试点地区实施的财政补贴机制可划分为

两类“一刀切”财政补贴激励机制和“差异化”财政补贴激励机制。所谓“一刀切”财政补贴激励机制是指地方政府对新农保试点地区个人账户规定的所有缴费档次统一给予某一固定额度财政补贴的办法,如所有缴费档次的补贴均为 30 元/年;所谓“差异化”财政补贴激励机制是指当地政府对新农保试点地区个人账户规定的不同缴费档次设置不同额度财政补贴的办法,一般是农民选择的缴费标准档次越高、政府财政补贴越多,体现出多缴多补的激励性特征。从全国层面看,河南、安徽、四川、甘肃等省份的新农保试点地区采用“一刀切”财政补贴激励机制,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份的试点地区采用“差异化”财政补贴激励机制。

表 2 政府财政对新农保的补贴概况

项目	缴费环节(入口)		给付环节(出口)		
	普通缴费群体	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的群体	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		提高和加发部分的基础养老金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中央财政	不补	不补	补助 50%	补助 100%	不补
地方财政	补贴(≥30 元/人/年)	补贴(≥30 元/人/年+适当补贴)	补助 50%	不补	补助 100%

依据激励理论,试点地区采用不同的财政补贴激励机制将对农村居民参保缴费档次选择行为产生显著差异。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人们通常是在生命周期的低收入阶段储蓄、低收入阶段负储蓄,可以说个体在一生不同的生命阶段内总是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配置储蓄的。假定利率水平等参数确定,在“差异化”财政补贴激励机制下,个体选择较高档次缴费标准参保无疑可以获得政府更多的财政补贴,因而,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民应该是选择最高的缴费档次。但是如采用“一刀切”财政补贴激励机制,个体选择可能将发生变化。Smwick (1995) 认为“养老金通常要求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才能领取造成养老保险强制性储蓄流动性比较低,因此,在强制养老保险和私人储蓄收益率相同的情况下个人往往偏好于流动性较强的私人储蓄。”从该视角分析,如果不同缴费档次的财政补贴一致,个人囿于对流动性资产的偏好往往会自发地选择最低的缴费档次。结合上述理论,这意味着在“一刀切”财政补贴激励机制下农民的理性

选择是按照最低档个人缴费标准参保,因为该选择既可以把对储蓄流动性的影响降到最低、又能享受与较高档次相同的财政补贴。而实行“差异化”财政补贴激励机制,参保对象将倾向选择最高档缴费标准,即“差异化”财政补贴激励机制能给个人带来更多的收益,从而能有效激励农村居民选择较高的缴费档次。当前,国内有学者也认为“一刀切”财政补贴激励机制缺乏激励效应,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农民选择最低缴费档次的主要原因是“一刀切”财政补贴方式,建议统一实施“差异化”财政补贴激励机制,进而激励农民选择中高档缴费标准参保(程昕 2011)。然而,新农保试点调研结果显示现实情况与上述理论不符,同类地区新农保财政补贴激励机制的差异并没有显著改善参保农民的缴费档次选择。辽宁大学课题组的调查结果表明,辽宁省实施“一刀切”财政补贴激励机制的试点地区中农村居民选择最低缴费档次的样本比例为 87.58%,推行“差异化”财政补贴激励机制的试点地区中农村居民选择最低缴费档次的样本比例为

86.21% ,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实施“差异化”财政补贴激励机制的试点地区中选择最低缴费档次的样本比例为 87.12%。对此,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农民在缴费档次选择上出现“就低不就高”的逆向选择困境?以往学者大多从定性角度分析新农保财政补贴激励机制效果,为解释农村居民在缴费档次选择中出现“就低不就高”的逆向选择困境,本文在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内构建项目投资收益模型,进一步实证分析新农保两种财政补贴激励机制对农民选择不同档次缴费行为的影响,以探求农民选择最低缴费标准的行为逻辑。

(二) 项目投资收益模型的构建

《指导意见》规定新农保实行权责相对应的原则,参保人每年需要缴纳一定额度的养老保险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方可领取养老金。对养老保险而言,从开始参保缴费到领取养老金通常存在几十年的时间差,从某种程度上讲,农村居民缴费参加新农保类似于投资一个中长期的养老项目,参保期间农村居民选择不同档次的养老费用进行分期投资,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后逐步取得投资的收益。因而,可构建项目投资收益模型对不同缴费档次的投资收益进行评价,进而从参保对象收益最大化角度对农村居民选择缴费档次的行为进行分析。

假定农村居民的参保年龄为 Y ,其选择的个人缴费档次为 A , B 代表政府对该缴费档次的补助, e 为参保投资收益率(Earning Rate), Z 为农村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用 i 表示参保缴费的时间。按照项目投资终值计算办法,参保者 60 岁时个人账户积累的养老保险基金为 M ,则有: $M = \sum_{i=1}^{60-Y} (A+B) \times (1+e)^{61-Y-i}$ 。按照新农保计发办法,个人账户按 139 个月来分摊,与基础养老金 S (《指导意见》规定基础养老金为 55 元/月/人) 相加,则得到参保者 60 岁以后每个月所领取的养老金金额。将领取养老金总额折算为退休时的养老项目产出总和 N ,则

有: $N = \sum_{j=1}^{Z-60} \frac{(S + \frac{M}{139}) \times 12}{(1+e)^{j-1}}$ 。假定参保对象从 25 岁开始参加新农保,农村居民的预期寿命为 72 岁^{*} 1,在 $M=N$ 的条件下,依据上述两个公式,可

以计算出参保人投保的内部收益率 e 。

上述已提及,农民是理性经济人,追求跨期投资收益的效用最大化。在不考虑人们经济行为差别的情形下,个人参保档次选择取决于不同缴费档次最终的投资收益率,即农民更倾向于选择收益率最高的缴费档次。

(三) 新农保财政补贴激励机制的投资收益评价

1. “一刀切”财政补贴激励机制的投资收益评价。目前采用“一刀切”财政补贴激励机制的试点地区以河南、甘肃、四川、辽宁(大连市除外)、安徽等省份最具有代表性。“一刀切”财政补贴激励机制下的个人缴费档次 A 和地方政府对个人缴费档次的补助标准 B 如表 3 所示。鉴于上述省份均按照国家《指导意见》基本方案规定的最低补贴标准(30 元/年)进行补贴,本文以《指导意见》作为“一刀切”财政补贴激励机制的典型进行实证分析,计算出不同档次缴费标准所对应的投资收益率。

由表 4 发现,按照《指导意见》规定的参保缴费档次和“一刀切”式最低补贴方案,最低档次缴费标准 100 元对应的投资收益率最高,达到 7.235%;而最高档次缴费标准 500 元所对应的投资收益率最低,仅为 4.017%,最高投资收益率与最低投资收益率相差 3.218 个百分点。同时,考察五个档次对应的收益率差额分别为 1.413%、0.824%、0.563% 和 0.418%,说明随着缴费档次的提升,收益率递减的速度逐渐放缓。但是,比较五个档次的收益率发现,参保者选择的缴费档次越高,养老项目投资的内部收益率越低,表明在“一刀切”财政补贴激励机制下不同缴费档次相对应的收益率呈现累退性特征。显然,在对不同补贴缴费档次都给予 30 元补贴的前提下,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农村居民选择最低缴费档次参保无疑是最优的选择。

表 3 《指导意见》规定的个人缴费档次和地方政府最低补贴标准概况表

个人缴费档次 A(元/年)	100	200	300	400	500
地方政府补助 B(元/年)	30	30	30	30	30

* 参照新农保个人账户的计发系数 139,个体的平均预期寿命应为 71.58 岁

在 $M = N$ 的条件下,指的是将参保者的缴费额和年老后领取的养老金都折合成 60 岁时的值,计算出《指导意见》规定的各个缴费档次下参保者的投资内部收益率 e ,参见表 4。

表 4 参保缴费各缴费档次的投资收益率

个人缴费档次 A(元/年)	100	200	300	400	500
参保投资收益率 e (%)	7.235	5.822	4.998	4.435	4.017

2. “差异化”财政补贴激励机制的投资收益评价。采用“差异化”财政补贴激励机制的试点地区以黑龙江、吉林和青海等省份最具有代表性。上述省份对选择较高缴费档次都给予了适当的激励性补贴,且具体补贴办法一致,如选择 100 元/年缴费档次的政府补贴为 30 元/年,在此基础上,缴费每提高一个档次,政府补贴增加 5 元。“差异化”财政补贴激励机制下的个人缴费档次 A 和地方政府对个人缴费档次的补助标准 B,参见表 5。这里以黑龙江省为例对“差异化”财政补贴激励机制的投资收益进行测算分析。

表 5 黑龙江省新农保试点规定的个人缴费档次和政府财政补贴标准对比表

个人缴费档次 A(元/年)	100	200	300	400	500
地方政府补助 B(元/年)	30	35	40	45	50

将养老金计算方法调整后的数据代入公式后,折合成 60 岁时的基金总和为 N ,在 $M = N$ 的情况下,计算出黑龙江省新农保“差异化”财政补贴激励机制下各个缴费档次的参保收益率如表 6 所示。

表 6 黑龙江省各缴费档次投资收益率

个人缴费档次 A(元/年)	100	200	300	400	500
参保投资收益率 e (%)	7.336	5.925	5.103	4.537	4.118

由表 6 可知,在“差异化”财政补贴激励机制下,最低档次缴费标准 100 元/年对应的收益率为 7.336%,在 5 个缴费档次中居于首位;而最高档次缴费标准 500 元对应的投资收益率最低,仅为 4.118%。与《指导意见》各缴费档次的投资收益率相比,以黑龙江省为代表的“差异化”财政补贴方式投资收益率整体上仅略高出 0.1% 左右。然而,比较各个档次对应的投资收益率,“差异化”财政补贴机制亦出现了累退效应,即农村居民选择参保缴费档次越高、相应档次的投资收益率越低。因此,在“差异化”财政补贴激励机制下农村居民选择最低缴费档次仍是理性的选择。

基于项目投资收益模型分别测算和评价“一刀切”和“差异化”两种财政补贴激励机制下各档次缴费标准的投资收益率显示,上述两种财政补贴激励机制都陷入了负向激励的困境,即随着缴费标准档次的提高、相对应的内部收益率却逐渐降低,形成了累退性趋势,在新农保现行制度框架内“一刀切”和“差异化”两种财政补贴激励机制都出现了负向激励效应。显然,这种负向激励效应是由新农保财政补贴激励机制设置不合理所导致的。现行财政补贴激励机制对农村居民选择最低缴费档次产生了较强的激励,而这恰恰有悖于政府财政补贴机制设计的初衷,简言之,现行财政补贴激励机制并没有达成正向激励的效果。基于上述分析,“一刀切”和“差异化”两种财政补贴激励机制产生的负向激励效应扭曲了农村居民选择与其支付能力相适应的缴费标准参保的行为,诱发并加剧了逆向选择问题。因而,新农保财政补贴激励机制下不同档次缴费标准的投资收益率评价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农村居民缴费档次选择“就低不就高”的行为动机。

四、结论与建议

新农保是一项自愿参与的具有社会化性质的养老保险。新农保试点中普遍存在的农村居民缴费档次选择“就低不就高”的逆向选择问题制约了新农保的可持续性发展。从省域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不同收入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两个维度考察我国农村居民参保缴费的支付能力发现大多数农

村居民具备选择中高档缴费标准参保的支付能力。基于项目投资收益模型测算并比较新农保试点采用的“一刀切”和“差异化”两种财政补贴激励机制下不同档次缴费标准的投资收益率显示两种财政补贴激励机制均产生了负向激励效应。在农村特定的政治、经济生态环境中,目前推行强制性养老

保险尚不切实际,因而需要在“自愿参保”的框架中逐步克服农民个人账户缴费档次标准选择中存在的逆向选择问题。

笔者认为,消解逆向选择问题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针对性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从短期看,设置合理的财政补贴激励机制,变定额补贴制为比率补贴制。现行新农保财政补贴激励机制采用的是“定额补贴制”,“定额补贴制”的优点是补贴数额均为整数,便于农民的理解和积极参保,其缺点是标准设置随意、不够科学且缺乏自动的调整机制。现行30~50元/年的财政补贴不仅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而且由于未能拉开不同缴费档次的补贴差距,最终使得“一刀切”和“差异化”两种财政补贴机制陷入负向激励的困境。为增强财政补贴的吸引力、提升农民参保的收益预期、提高新农保待遇水平,真正凸显出新农保财政补贴激励机制的正向激励效应,必须设置合理的财政补贴机制以达成农村居民缴费档次越高、收益率越高的制度激励效果。在具体机制设计上,政府财政在对各缴费档次进行补贴时需设置科学合理的差距,依照“拉大不同缴费档次间的财政补贴差距”原则,变定额补贴制为比例补贴制。比率补贴既能拉大不同缴费档次间的差距,又具备自动调整财政补贴水平的功效。具体设计方案有两种:一是设置“固定比例补贴”机制,即所有缴费档次按照固定比例给予补贴。如可采用30%的比例,则地方财政补贴费用依次为100元补贴30元,200元补贴60元,300元补贴90元,400元补贴120元,500元补贴150元。二是实施“累进比例补贴”机制,即选择的缴费档次越高、财政补贴比例越高。如100元/年档次的比例为20%,200元/年档次的比例为25%,300

元/年档次的比例为30%,400元/年档次的比例为35%,500元/年档次的比例为50%,但这一补贴方式对地方政府的财力要求比较高。考虑到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比较大,地方可结合实际情况,以“高档次,高回报”为落脚点,科学设置适宜的财政补贴激励方案。第二,从中长期看应持续实现农民增收,适时推行“强制性”参保原则。新农保制度强调保障老年基本生活需求,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农村居民首先不得不应付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医疗支出和日常生活支出等诸多即期需求,在农民收入水平整体不高的背景下农村居民的即期消费往往挤出养老消费。因而,持续实现农民增收、让农民真正富起来,他们才能选择更高的缴费档次参保,尤其是对于低收入群体。鉴于此,国家需要“多管齐下”努力开拓农村居民的增收渠道,进一步加大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加大对农村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投入,提高农民素质,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确保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升。同时,在农村居民增收的背景下,适时推行“强制性”参保。新农保试点初期实行“自愿参保”和“自主选择缴费档次”有其合理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新农保将一直奉行“自愿”原则。新农保本质上是一项公助自保型的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制度本身作为社会保险的一种形式本来就应该遵循社会保险的强制性原则。不论是国内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还是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基本社会养老保险都是以“强制性”为准则的。从长期来看将“自愿”转换成“强制”是必然趋势。政府需要适时把握机会窗口,积极促进新农保制度由“自愿参与”转变为“强制参与”。

参考文献

1. Akerlof, George A.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ative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4(Aug): 488 ~ 500, 1970.
2. Samwick Andrew A. The Limited Offset between Pension Wealth and Other Private Wealth: Implications of Buffer-stock Saving. Mimeo, 1995.
3. 黄明静. 农户参加新农保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省蒙城县立仓镇的调研. *长春大学学报*, 2011(5): 21 ~ 23.
4. 程昕, 王国辉等. 新农保缴费问题的研究——基于阜新市彰武4乡镇的新农保调查. *农业经济与科技*, 2011(6): 199 ~ 201.
5. 林义. 破解新农保制度运行五大难. *中国社会保障*, 2009(9): 14 ~ 16.
6. 邓大松, 薛惠元.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替代率精算模型及其实证分析. *经济管理*, 2010(5): 164 ~ 171.
7. 钟涨宝, 李飞. 动员效力与经济理性: 农户参与新农保的行为逻辑研究——基于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的调查. *社会学研究*, 2012(3): 139 ~ 156.

开放式创新、政府扶持与农业龙头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 *}

□ 崔海云 施建军

内容提要: 本文从开放式创新视角分析了政府政策在农业龙头企业开放式创新与其绩效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不同的政策在不同的创新模式下追求不同的绩效目标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政策效果。因此,政府在制定农业科技政策时应采用权变管理的理念,针对具体的绩效目标和企业的创新模式制定相应的政策。

关键词: 开放式创新; 政府扶持; 农业龙头企业绩效

一、引言

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是当今社会广泛关注的课题,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政府在推进科技创新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必要途径,是我国“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关系到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农民增收等重大问题。农业龙头企业的开放式创新模式将产学研有机结合起来,是农业科技创新进程中最具活力的创新方式之一,在推动我国农业科技进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也获得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因此,对农业龙头

企业开放式创新以及政府的相关扶持政策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目前有关农业龙头企业开放式创新的相关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而有关政府扶持方面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等方面的定性研究,对于政策执行效果以及如何选择政策的实证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将以农业龙头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政府扶持政策在龙头企业开放式创新过程中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进而为政府制定农业科技政策提供参考。

-
8. 陈荣卓, 颜慧娟. 农民眼中的“新农保”: 认知、意愿与评价——基于湖北省4县763位农民的调查.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2): 53~58
 9. 穆怀忠, 闫琳琳.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参保决策影响因素研究. 人口研究 2012(1): 73~82
 10. 毕红霞, 薛兴利. 财政支持农村社保的差异性及其有限责任. 改革 2011(4): 4148
 11. 李 珍, 王海东. 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下降机理与政策意义. 人口与经济 2010(6): 59~65
 12. 郭于华. “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 重读农民学经典论题. 读书 2002(5): 104~110

(作者单位: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大连, 116025) 责任编辑: 方 静

^{*} 项目来源: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十二五”时期我国发展的创新驱动战略研究”(编号: 11&ZD00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十二五”时期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创新能力测评实证分析”(编号: 10AGL009)

Are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Willing to Stay in the Working City ? the Influence of Home Household Registry and Human Capital

..... LUO Xiaofeng and DUAN Chenrong(65)

This paper has conducted an in-depth analysis on people's willingness to stay in the working city and factors influencing it by using the monitoring data of 8959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t shows that except from education and health ,which are the features of human capital ,home and household registry are also the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willingness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o stay in their working cities. By using housing sources and family members to represent "material homes" and "spiritual homes" respectively ,this paper finds that "material homes" influence more the willingness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o stay in their working cities. The policy implication is that if China wants to promote urbanization healthily and orderly ,we should enable those migrant workers of new generation to move to live in cities gradually and satisfy their basic needs for survival. Home ownership scheme may be the very important policy means to it.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and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or Exampl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in Jiangsu Province ZHU Xuexin and ZHANG Yujun(72)

Dilemma of "Adverse Selection" And Financial Subsidy Incentive Mechanism Design of 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ZHAO Jianguo and HAI Long(77)

In the principle of farmer selecting contribution levels on his own ,Farmer generally choose the lowest contribution level ,resulting in 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having been plagued by the problem of adverse selection. Combined with the farmer's capacity of payment and financial subsidy incentive mechanism design of 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which are two main factors affecting farmer selecting contribution levels ,the paper found that farmer's capacity of payment was not the key factor which induced adverse selection ,examine the current farmer's capacity of payment from the provincial and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Building the protects investment income model ,the paper analyzed "One size fits all" model and "Differentiated" model of financial subsidy incentive mechanism design of 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wo models both produced negative incentive effects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current financial subsidy incentive mechanism induced and exacerbated the problem of adverse selection. Resolving adverse selection is a gradual process.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setting a reasonable financial subsidy incentive mechanism design and changing the fixed subsidy system into the variable rate subsidy system in short term. In medium-and long-term ,increasing farmer income constantly and taking the principle of "mandatory insurance" timely and prudently.